

华夏传播研究丛书



传在史中

——中国传统社会传播史料选辑

● 郑学檬 编著

文化艺术出版社

华夏传播研究丛书

传在史中

——中国传统社会传播史料选辑

● 郑学檬 编著

文化艺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传在史中：中国传统社会传播史料选辑/郑学檬编著

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1. 5

(华夏传播研究丛书)

ISBN 7-5039-2029-7

I. 传… II. 郑… III. 传播学-史料-选辑-中国-古代 IV. G2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24902 号

传 在 史 中

——中国传统社会传播史料选辑

编 著 者 郑学檬

责任编辑 帅雯霖

出版发行 文化艺术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丰台区万泉寺甲 1 号 100073

网 址 <http://whysbook.yeah.net>

电子邮件 whyscbs@126.com

电 话 (010) 63457556 (发行部)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文化局灵山红旗印刷厂

版 次 2001 年 5 月第 1 版

2001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7.75

字 数 180 千字

书 号 ISBN 7-5039-2029-7/J·609

定 价 54.00 元 (全三册)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印装错误，随时调换。

华夏传播研究学术委员会

- 余也鲁教授 (香港中文大学传播学讲座教授、
 厦门大学客座教授)
- 徐佳士教授 (台湾国立政治大学原文理学院院长)
- 郑学檬教授 (厦门大学原常务副校长、
 厦门大学传播研究所名誉所长)
- 孙旭培研究员 (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原所长)
- 陈培爱教授 (厦门大学人文学院副院长、
 新闻传播系主任)

华夏传播研究丛书编委会

- 主 编：郑学檬
- 编 委：余也鲁 徐佳士 郑学檬 孙旭培 陈培爱
- 协调人：黄星民
- 主 办：厦门大学新闻传播系
 厦门大学传播研究所

《华夏传播研究丛书》总序

郑学檬

《华夏传播研究丛书》自 1993 年初议,1995 年正式立项、1999—2000 年首批书稿完成,历时 8 年,其间海峡两岸三地的相关学者,多次切磋,共商大计,筚路蓝缕,终成弘绩。回首往事,虽叹岁月之易逝,然亦有感于有志者事竟成也。

《华夏传播研究丛书》计划的酝酿和形成。

1993 年在余也鲁、徐佳士、孙旭培、郑松铨等海峡两岸三地传播学者的鼎力支持下,在厦门大学举行了“海峡两岸中国传统文化中传的探索座谈会”。这是一次研究“传播学中国化”问题的重要会议。由于出席者中不少是当时两岸三地新闻传播学界的有代表性的知名学者,并且会议的主题“‘传播学中国化’和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去探索中国传播观念理论和实践”十分醒目鲜明,所以,会上纲举目张,很快形成共识。会议论文结集收在《从零开始》一书中,由厦门大学出版社于

1994年印行。

这次会议的另一个收获,就是议定出版一部概论性著作,就27个与中国传播有关的选题,向海峡两岸征稿,并请当时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所长的孙旭培先生玉主其事,反应至为热烈,不少学者、学子报名参加,结果是《华夏传播论》的编成,由人民出版社于1997年出版。

共识既已形成,跨学科的开创性探索也已开辟新途,“中国传播研究资助项目”遂于1995年正式形成方案,通过《新闻与传播研究》刊物,向国内新闻传播和文史学者招标。先后两次立项,计五史六论,11个项目。

这个资助项目主要目的是为了帮助中国学者进一步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探索并整理出已有的传播思想,建立中国传播理论,促进“传播研究中国化”,从而丰富人们对传的行为的认识,为社会科学研究提供更准确的分析和解决问题的思考方法。

无疑,这个项目非常有学术意义。“传播研究中国化”离不开三个基础工作,这就是引进吸收国外的传播学研究成果,调查研究中国当代的传播现状和发掘光大中国传统文化中潜藏的传播理论。三者必须鼎立,否则整个“传播研究中国化”工作就会倾斜。“中国传播研究资助项目”支持其中较为薄弱却又必不可少的一环,其学术上的意义也就不言而明了。

这个项目不仅很有学术意义,还很有时代意义。它企图打通这个时代的人们关注的两个热点:中国传统文化和信息时代。众所周知,20世纪下半叶世界格局的主要变化之一是中华文化圈的崛起,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时代意义也就倍受世界的关注,成了我们这个时代的热点之一。我们的时代又

是一个传播技术飞速发展的时代。研究信息传播自然属性的当代信息科学,已成了时代的热点,而研究信息传播社会属性的传播学,也受到全社会的普遍关注,也势必成为这个时代的热点。“中国传播研究资助项目”抓住这两个热点,并寻求它们之间的联系,其时代的意义也就不言而喻了。

正因为“中国传播研究资助项目”具有上述的学术意义和时代意义,它受到热烈的反应和广泛的支持、参与。

二

《华夏传播研究丛书》的进展。

根据多次磋商,我们确定“中国传播研究资助项目”选题范围包括以下 12 个领域:

- 1) 中国传播文化中有关传的起源、特性、作用与概念(侧重古代文化与洞穴文明的探索)。
- 2) 符号、媒介与传播包括语言、文字、非语言传播。
- 3) 环境与传播,包括自然环境、人工建设(例如运河、长城)及政治、社会环境变化对传播的影响。
- 4) 政治传播,包括政治设施、变法维新及朝野之间传通的作用和影响。
- 5) 思想与文化传播,例如百家争鸣,西学东渐,文学创作与翻译、教育与教化。
- 6) 经济传播,例如农耕技术、商业信息、货币流通等影响。
- 7) 民间传播,包括个人、群体和组织传播等渠道的研究。
- 8) 说服传播,包括合纵连横等论辩术与说服技巧的研究。

9)中国人际传播的特色,从道德修养到人体语言。

10)传播体制的研究,包括信息的储存、传递和控制。

11)中外信息交流对中国文化发展的影响,包括佛经、基督教圣经的翻译、丝绸之路、郑和下西洋及西方宗教与思想的传入。

12)古代新发明与新思想诞生的过程、阻力及限制。(火药、活字印刷、历法、天文仪等古代早已发明,但没有得到发展的空间,直到明清西风东渐,中国才享受到“文明回流”的成果)

毫无疑问,这一研究项目设计是宏观的、全方位的,它广纳百川,延揽各方学者参与。经过数年努力,11位学者参与的“五史六论”的11个项目,将陆续付梓。可以说《华夏传播研究丛书》的进展情况是值得高兴的,为中国传播学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这样一个深远的研究项目,是由余也鲁教授发起,厦门大学传播研究所组织实施,并得到了香港海天基金会、厦门大学新闻传播系及联合基金会的资助,玉成其事。在此,我代表丛书编委会向余先生和上述单位致以衷心感谢。

序

余也鲁

传是人类社会最基本的行为。

历史在本质上只是人类传活动的记述。

人自出生的啼声,到牙牙学语,到听母亲的摇篮曲,经历数不清的大脑和身体对周围人物与环境的反应,一直到停止呼吸和心跳,到其他人为他唱哀歌和致悼词为止,传的行为,以自己或他人或整个社会为对象,从没有止息,甚至睡梦中传的热闹,也不下清醒时。

传的活动从个人开始,但不终止于个人;它融入群体,又受群体所影响;它从上一代承传下来,又传递到下一代。

语言是传的重要工具,是有效社会传通行为的伟大发明。《圣经》讲上帝打乱了人的语言,高可通天的巴比塔便建立不起来;我们可以从不同语言中找到许多共同因素,但迄今仍没有一个大家共用的语言。

但人类并不全靠语言来沟通,来建立起共通。我们还有体语、烽烟、锣鼓,还有音乐、绘画和雕刻。我们可以用一朵玫瑰花、用选举的一票或者派艘军舰在大海里示威一下,来表达千言

万语不容易表达的爱情、政治意见和外交意向。

一部传通史其实就是一部人类求生存、寻找和建立社会秩序、追求美好生活和消除获取更大幸福的阻碍的记录。

但地球上的气候、地理环境、物产的不同，人们想出来的传播的手段也就各异。文化的歧异和多样，大半是我们解决问题所用方法不同的结果。西方人吃面包、中东人吃饼、中国人吃米饭和馒头，虽然都是为了填饱肚子，能够生存下去，但从这个基本的吃的行为引发出来的饮食文化和社会礼仪与制度，以及用手、刀叉和筷子进食的传的行为的不同所滋生出的农业与工业生产上的不同需求，形成了多姿多彩的世界文化形态，启迪了多少人对生命意义的探索。

生活在高原乡村里的人和生活在江南小桥流水的农庄里的人，各有各的有声与无声的传的方式和解决问题的手段，其间不同便很大，引发了不少人类学家到少数民族地区探幽寻秘的兴趣。

我国历史悠久，几乎是仅存的一个欣欣向荣的文明古国，但因为文字发明比别文化早，而中文的内聚力又十分坚韧，虽有从繁到简的演进，但没有根本上的改变。中国人的一个优秀传统，是以文传世。古人崇尚立言，以理服人，笔之于书，传诸后代。其实，立德这种涉及建立法律和制度的传世行为，以及立功这种确立解决社会困难的方法，哪一样不是传？而且它们大都被记述传递了下来。中国传播史料的丰富的确是世界之冠。（希伯来人的文字，历史之长与我国不相伯仲，但文字记载散佚甚多，能传至今天的非常有限。《圣经》因此成为其宝贵遗产，也是人类文明的瑰宝。）

但因为传的行为太普遍，大家习以为常，正如《韩诗外传》所说，“终身戴天，不知天之高，终身践地，不知地之厚”，天文、地

理、衣食住行等等都有人研究,偏偏没有把传通这种基本行为当做专门学问。美国的学者在上世纪 40 年代,因大战爆发,有了训练新兵发奋作战的需要;又因广播的出现,须了解这种新媒体怎样影响选举,因而展开了在社会和心理学方面对个人态度形成的研究。政治学者也不落后于人,加上从事大众传播和舆论形成研究的学者的努力,到 60 年代,在宣伟伯博士(Dr. Wilbur Schramm)集大成的宏观建树下,才有了以 Communication 命名的新学科,并借鉴物理科学,引入计量方法,希望将变化难测的人的传的行为纳入可以预测的科学研究中。欧陆学者则从文化研究入手,探讨现代大众传播如何影响文化素质。国家、民族不同,传播研究的重心也便有了分别。

有人将西方发展出的传播理论介绍过来,用其方法,在中国人的当前生活中验证;有人主张要建立自己的理论,应该靠新的文献,从新近的经验中去汲取素材,不必靠祖先已积累的经验,也能闯出一条路。这样虽都可行,但研究人的传播,不可以把自己局限在时间的地方主义里。我们不仅有丰富史料,也有迫切需要,来建立起我们自己的传播研究。

我在《从零开始》(郑学檬、余也鲁主编,厦门大学出版社出版,1994)一书《论探索》一文中以及在集海峡两岸 27 位学人同撰的《华夏传播论》(孙旭培主编,人民出版社出版,1996)里,都对这作了探讨,就不在这里复述。我在《论探索》中说:“从中国历史中去探索传的理论与实际,也许可以比诸考古学,考古学家从岩石的碎块和露出地面断层所记录的地壳变动和信息,建立起山脉、荒原等形成的理论,据以预告未来地层的变动和地震等现象。我相信,研究中国的历史(包括文史哲)与传统,对深潜在中国文化中的传的艺术作系统与科学的发掘和整理,作出大胆的假设,在现代社会生活中小心求证,一定可以探索出一些传的

心理的理论架构,并找出道路,来开辟一个传学研究的新天地。”

本书编写者郑学檬教授是一位历史学家,也是隋唐史的研究权威。他博闻强记、饱览古籍,是我认识的历史学者中最敢推陈出新的一位。1991年和他初晤于港岛,发现他知识的广博遍及文史与哲学,对现代社会与世界学术发展尤多认识,是一位可以向他求教“探索中国传学”的学人。2个小时的畅叙和以后的多次细谈,听他讲中国古史中传的艺术的小故事,如数家珍。大家觉得若能在宏观的中国传播断代史已列入《华夏传播研究丛书》的写作之外,更有微观的中国传统社会史料的选辑,向生长在现代中国文化里的读者,介绍结晶在中国古籍中传的经验 and 原则,应该具有启发作用,对开拓进一步的研究工作大有益处。

这部初编的材料选自210种古籍,上溯《周易》、《诗经》、《书经》,中经《汉书》、《通典》,下及《日知录》、《梦溪笔谈》、《西厢记》、《聊斋志异》等。他涉猎之广、用功之深、选材之精,读了这本书后便可知道。

这本书的价值,不仅在于将存在于中国史籍中的珍宝一一发掘,而且在于能指出这些古人的传世文字中所包涵的中国人的传的智慧。又将所录文字中难解的词和句作了解说,方便不谙古代用字的读者了解其意义。

尤其难得的,是作者将这些资料作了分类,并且编了一个“传播项目索引”,凡252条,便利读者按图索骥。我要特别指出的是,作者从所接触的文史资料中,一再发现古人对自然、人文、文化环境影响传播过程的深刻认识。他又找出各种文告、信函、历法、诗歌、民间货物叫卖、题壁等等独具中国特色的传的方式,无不可以作为研究中国传播的入口。作者指出自己不是传播学家,其实此书本身就是一次有效的传通。

在西方传播学中浸淫过的人,读了这本书和“华夏传播研究丛书”中其他著述,应该可以明白从中国传统泥土中发掘出来的传的认知和见解,与其他文化中所发现的有所不同,然后参考西方已有的成绩,替我国今后的研究题目与方向开拓一些入口和门径。

本书是作者积涓滴成江河之作,我有幸能先睹其成,获益匪浅。万事开头难,中国传播研究刚刚起步。《礼记》勉人“入境问禁,入国问俗,入门问讳”。对于中国人的文化与行为中的禁、俗和讳,通过对中国传的探索,应该可以帮助自己和其他文化中的人认识中国,向我们“长春的文化”学习。

2001年1月海天书楼

前 言

—

关于本资料编辑的缘起,要追述到 1991 年夏天我和余也鲁先生的一次会见。大约是 8 月下旬,我参加在港大召开的“国际隋唐史学术讨论会”后,去看望余先生,那时我担任学校副校长兼管新闻传播系的事,自必和我校的顾问、新闻传播系的创办人之一的余先生有联系。通过电话联系后,他邀我到九龙的半岛酒店叙谈,那是招待高贵客人的地方,进出无白丁,算是一种礼遇。晤谈中,余先生向我介绍了他的“传播中国化”抱负,令我起敬与深思。他说了诸如“秀才不出门,也知天下事”之类中国传统社会传播的例子。我是从事中国古代史教学的,虽然重点研究唐五代社会经济,但总是读了不少中国古籍,在余先生的启发下,也班门弄斧地参加讨论起来。记得余先生见此不但不觉多余,反而兴奋之情溢于言表。双方竟然投机起来,忘乎所以。余先生说:“你也来参加吧!”就这样,一个传播学的门外之人,卷入了一场旷日持久的研究。

1993年在厦门大学召开了“海峡两岸中国传统中传的探索座谈会”以后,香港海天基金会设立了“中国传播资助项目”。1995年遴选出13个项目,除本辑资料外,有断代传播史、传播原理研究和专题传播研究12项。

本辑资料的选编工作从1995年全面开始,当时有七八位历史系的博士生、硕士生参加。1996年底,辑出资料20几万字,但真正可用的十不存一。1997年1月,我重新开始选编工作,一本一本古籍查阅,凭自己有限的传播学知识,去搜寻中国古代的传播史料。至1997年夏,大约辑出5万余字,并为每一条史料写了简释。初稿打出后,于年底交余先生审阅。余先生看后大为兴奋,并提出早日付梓的建议。我们商量后,由我抓紧时间增补,终于在2000年底完成。本辑资料的释文由我撰写,经余先生过目,并据先生之意见作了多次修改。这是1991年半岛酒店晤谈后,余先生和我合作推进“传播中国文化”的第一个成果。

二

本辑资料分为7章,依次为传播的开始、传播的观念、传播的原则、传播的过程、传播的环境、传播的技巧、传播的形式等。每章选辑的资料多少不一。从所辑资料中,我发现了中国传统社会人们对传播意义、作用的深刻认识以及人们所遵循的传播原则与天生的逻辑观念,从中可意识到,丰富的传播宝藏就蕴含在伟大的中华文化体系之中!

现在择要介绍各章的精彩史料并略加评述。班固《白虎通德论》卷下对圣人的品格、素质作了这样的概括:“圣人者何?圣者通也,道也,声也。道无所不通,明无所不照,闻声知情。”班固

把圣人具备的三条件概括为通、道、声。其中通与声包含着信息灵通的意思,可见,圣人这个称呼(名词)是和传播联系在一起的,这实在是一个惊人的见解!

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充满礼治,天人合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观念的社会,人们传递和接受信息都有自己的观念与逻辑。如礼治的原则是分清君子、小人,所谓“君子道长,小人道消”。这里的“道”指气势,含有舆论影响,重视君子舆论的主导地位,维护礼治等级社会的稳定的意思。为了稳定,人们总结历史经验,主张慎言,所谓“无言不仇”(仇,校正、驳议);主张言行一致,所谓“言不务多,务审所行而已”,“与民约信”。传播在治国治世中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许多记载讲明与暗,讲下情上通,讲教化,都体现了传通信息对于治国、治世的作用。还有人涉及“人心有所蔽,有所通”的问题,把人际传通与明暗提到哲学高度上来认识。

中国传统社会特有的文化背景,形成了自己的传播原则,如是非原则、兼听则明原则、听言责实原则、言无贵贱原则等等。这里我想提一提人们所不熟悉的“言无贵贱原则”。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等级社会,强调别贵贱,但在访问民意或了解下情时,凡属明君、贤臣,总是不耻下问。因为信息只有真伪、轻重之分而无贵贱之分,下臣、草民如果知道了重要信息,你不问他们,问谁?说明自古以来,信息有相当的独立性,不易为某一阶层的人所垄断。还有一点是,中国传统社会讲“委顺”,讲一统,似乎没有独立思考和自由思想,这是误解。最具代表性的是春秋战国时代的百家争鸣。即使目为“死水一潭”的宋代,江西士人就“好为奇论,耻与人同,每立异以求胜”,表现出舆论的活跃。正因为有“好奇论”,所以有“言者无罪”之原则,主张心悦诚服,这种优秀传统,至今仍十分有价值。

从已辑出的资料看,传播过程的复杂性,应引起研究者的高度重视。因为我每选一条资料,都要加以分析,查阅相关记载,所以深感传播的过程是异常复杂的,这种复杂情况了解愈多,愈能明白古代传播的含义。如本书所选南宋高宗一行引起物价波动一例即颇有价值。南宋高宗赵构,到南京巡幸后返回平江府(今苏州),途经丹徒县新丰镇,丹徒县主簿准备了物品供高宗一行取用(叫供顿),谁知高宗只要了两篮生菜,消息传到下一站,“生菜遂为珍品”。说明信息反馈之速和信息有价。另外一个例子是明代松江知府李多见面任所引起的风波,也说明信息、舆论在传播中的“失真”、误导和冲击现象是值得认真研究的。其间道理亦有参考价值。

传播与环境关系密切。任何传播都在一定的政治和人文社会环境中进行的,所以,首先表现为环境对传播的制约作用。如政治环境,用古人的话说就是“天时”加“人谋”,对舆论的导向起着决定性作用。至于人文社会环境的影响更加值得重视。“名人效应”就是人文环境对传播产生影响的一个例子;地方风俗的形成和传播,则是基于独特自然环境和人文精神所形成的社会现象,本书选辑《汉书·地理志》史料,所论生动。尤其讲到颍川的教化(移风易俗)时,道出了“君子之德风也,小人之德草也”,君子主导型传播,是中国传统社会移风易俗的基本模式,颍川是“风草论”的实验区。

传播技巧之发掘尤为今人所重视。从选辑的史料中可以看出,说服技巧中,高超者使人悦目、悦耳、悦心,这种提法,可以成为今日广告设计之原则。至于运用晓谕、对比、设奇和投桃报李等技巧说服对方、挫服论敌,更是古人辩智的表现。

最后,在“传播的形式”中,选辑了有关语言传播(谚语民谣、文书语言、交际语言、文学语言、方言俗语)、邮驿传播、移民传